

普实克和夏志清的鲁迅研究及其方法论反思

沈杏培

【摘要】 普实克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开启了迥异的学术思路和研究范式:普实克同情中国革命,以社会历史分析的方法肯定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实品格,褒赞鲁迅的历史功绩;而夏志清受新批评派的影响,重视对作品自身价值的鉴别与评价,加上冷战背景和历史偏见,他的鲁迅研究实践了去历史化和矮化鲁迅的诉求。两人的这种学术分歧经过1961—1963年的“普夏之争”得到了更为鲜明的呈现。本文结合普夏结缘鲁迅的历史背景,追踪他们学术实践的理论资源,辨析“普夏之争”中各自的鲁迅观和鲁迅研究的特点或局限,最后反思普夏两人的文学史写作与政治偏见、作者意图、历史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 普实克;夏志清;鲁迅研究;社会历史;新批评;作者意图

在海外鲁迅研究的学人中,普实克和夏志清是两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普实克、夏志清两人的现代文学研究分别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在西方汉学界和大陆学术界均产生了重大而持久的影响。两人结缘中国现代文学的方式不同,普实克来华游学,结识郭沫若、冰心、郑振铎等人,并与鲁迅书信往来,回国后著文立说,出版回忆与游历文章,撰写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文章,翻译鲁迅作品;夏志清20世纪40年代后期赴美之后,接受欧美教育,先是在官方机构资助后在个人学术兴趣驱使下撰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文章。两人渗透在研究对象上的立场也迥异,普实克同情中国革命,认同中国左翼文学的现实情怀和历史功绩,把鲁迅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方向性人物,而夏志清对鲁迅和左翼文学则怀着某种固执的敌视和偏见,以崭新的史观重新整饬现代文学史的肌理,以新批评的方法和“伟大传统”的坐标解读现代作家作品。两人的这种学术异见以1961—1963年在欧洲著名刊物《通报》上的论争达到顶点,通过这次“普夏之争”,两人的“鲁迅学视野”和“现代文学史观”进一步得到了彰明。可以说,普实克和夏志清的学术争鸣,带有特定的“冷战背景”或意识形态色彩,但由这份学案所衍生而成的论争史、阐释史,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已成为一份重要的学术遗产,值得我们细细梳理。本文试图重新检讨普实克、夏志清(以下简称普夏)现代文学研究和鲁迅专论的学术理路,追溯他们的鲁迅学各自濡染或启用的理论资源,并对他们各自研究的优劣进行反思。

沈杏培,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南京 210097)。

一、普实克、夏志清结缘鲁迅的历史背景与学术研究的理论资源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始于1952年。在此之前,“我在国内期间,虽也看过一些鲁迅、周作人、沈从文等人的作品,但看得极少,对新文学可以说完全是外行”。^①与此呼应的是,夏志清在北大读书和去国求学时则接触了大量西方文学经典。夏志清自中学时代英文较好,又喜读大作家的全集,读遍丁尼生、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在北大时几乎把“伊丽莎白时代诸大家一网打尽”^②。他还自修德文,读完歌德、海涅、席勒,在理论上涉猎批评家休劳的《论布雷克》和波洛克斯的《精致的骨坛》——波洛克斯的新批评日后成为了夏志清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抗战爆发后,夏志清入光华大学英文系,主修西洋文学,从英国诗歌入手,遍读特莱顿、勃朗宁等大诗人的全集。

对于鲁迅,夏志清似乎有种天然的排拒和决绝的疏离。《中国现代小说史》给予鲁迅的篇幅是很少的,对其作品的分析缺少深度也很不系统,对于鲁迅的文学史定位也是语焉不详。夏志清对于小说史“激活”了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和张天翼颇为自得,一直到晚年仍然认为自己的文学史“讲了四个人”,他认为“最大的遗憾”是疏忽了萧红、李劫人这几个重要作家^③。他并不觉得冷遇作为“新文化的旗手”的鲁迅有何不妥。

从时代背景来看,夏志清无疑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冷战格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冷战文化影响了夏志清对作家的取舍和渗透在研究对象中的文学史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47年到1991年,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形成对峙状态,这种相互遏制,不动武力的状态即为“冷战”。1951年的夏志清,还是耶鲁英文系的学生,此时面临着写论文,尤其是找工作的生计之忧。此时耶鲁大学政治系教授饶大卫(David N. Rowe)刚从政府领到一笔钱,正在招聘人马急欲启动研究。夏志清很快加入了饶大卫的《中国手册》编写团队,年薪4000美元。据夏志清介绍,《中国手册》是供美国军官阅读的内部资料,立场上反对红色政权。尽管这份资料后来未被美国军方重用,黯然淡出,但夏志清一人撰写了《文学》《思想》《中共大众传播》三大章,尤其是《文学》这部分正式启动了夏志清的现代文学研究之路。1952年,夏志清为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计划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资助,获得认可和充足的补助金,并开始了为期三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④。值得注意的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确保国家安全,美国政府与公立、私立大学合作在校园监控、举报左派人士。同时,还利用慈善性基金会作为掩护机构隐秘开展中央情报局项目——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内,卡内基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当时最大的三大私人基金会,此时都在政府的意识形态渗透和操控之中。可以说,“就在联邦政府与基金会资助下,学术界开始结成新的区域研究单位,打造起冷战学术体制”,“夏氏兄弟正是透过带有政治任务的学术体制,方得以逐渐开展他们的研究,从而建立起在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实践他们关于报国与学术的理念”。^⑤这种冷战文化塑造了夏志清的文化心理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策略。由于对红色政权的敌视,夏志清非常抵制鲁迅——认为鲁迅是官方刻意推崇和塑造的“神话”,并在文学史写作中淡化、贬低鲁迅。同时他对左翼文学的重要人物丁玲、茅盾等的评价也极为严苛。

夏志清的小说史写作受英美“新批评”的影响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曾详细叙说过写作现代文学史时的理论储备,包括他在1950年代初期对新批评派小说的阅读,以及让他“受惠不浅”的英国大

①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中译本序第6页。

②夏志清:《鸡窗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前言第9页。

③季进:《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与批评,永远是我的首要工作——夏志清先生访谈》,《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4期。

④这部分史实参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序第5—7页。

⑤张鸿声、[韩]朴宰雨:《世界鲁迅与鲁迅世界:媒介、翻译与现代性书写》,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0页。

批评家李维斯(F. R. Leavis)的《大传统》对他的影响^①。新批评派是英美现代文学批评里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流派,20世纪20年代发端于英国,20世纪四五十年代在美国蔚然成风。“新批评”的鼻祖波洛克斯(Cleanth Brooks)是他在耶鲁时的业师,新批评的其他几位大将也是他的老师。对于夏志清来说,这种学术环境的濡染和研究方法上的师徒传承是很明显的。新批评派本质上坚持的是作品本体论的论调,所反拨的是此前流行甚广的实证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批评,这一流派坚持文学批评应由社会历史转向文本,从作家转向作品等共同主张。新批评派把文学批评由先前的外部研究引向了内部研究,让人们关注文本内部的语言、结构、文体等风景,但其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专注文本和语言的内部研究,从而忽视了文学与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天然关系,暴露它的偏执与片面性”,“孤立地研究个别作品,不仅割断了作品与历史、文化和社会的联系,还破坏了文学研究的整体性”。^②

无论是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解读,还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夏志清启用的批评方法是新批评派的路数,即在鲜明的世界文学比较视野下,使用文本细读的方法,重视对作品自身价值的鉴别与评价,较少以政治、历史等非文学的标准确定作家作品的高低——之所以说“较少”,是因为尽管夏志清客观上使用了新批评的方法,尽可能忽略文学的历史因素和意识形态色彩,从而追求他所确立的“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③的宗旨,但由于夏志清主观上对于鲁迅和部分左翼作家的厌弃,以及苛刻的“伟大作家”的文学标准,而使其中国文学研究实践在“去政治化”的外衣下隐藏着另一种政治偏见与意识形态色彩。在1960年初版《中国现代小说史》所作的序言里,夏志清这样坦承自己的学术思路:“这项研究当然不是作为政治学、社会学或者经济学研究的附庸而筹划的。文学史家的第一项工作永远是对优秀作品的发现和评价:假如他仅仅把文学材料视作反映某个时代政治和文化的一面镜子,他的研究将对学习文学的学生以及其他领域的学者们毫无意义。”^④在晚年的访谈中,对于这一研究方法他仍然毫不动摇,“作为文学史家,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与批评,永远是我的首要工作。我到现在仍然坚持这一点”。^⑤正如刘绍铭所说:“由于他的科班训练有异于汉学传统,因此他读的不论是线装书或是横排的现代文学作品,见解若与时俗大异其趣者,亦不足为怪。”^⑥

普实克(1906—1980),捷克斯洛伐克著名汉学家,早年在捷克的布拉格、瑞典的哥德堡、德国的哈勒和莱比锡等地学习汉语和中国历史与文学。在布拉格查理大学读书时,主攻古希腊罗马历史,后来受其导师著名汉学家高本汉的影响,学业兴趣开始转向中国。关于普实克与鲁迅的结缘和交往史实,通过普实克的《回首当年忆鲁迅》^⑦《中国——我的姐妹》^⑧、戈宝权的《鲁迅和普实克》和陈漱渝的《普实克和他的东方传奇》^⑨等文,可以清晰地看到普实克走进鲁迅、译介鲁迅,以及两人在1930年代短暂的书信交往过程。1930年代初期,普实克来华研究中国历史,无意间一个叫王福时的大学生送给普实克一些鲁迅的杂文集,这些像匕首一样的文字令他“惊喜交集”,“鲁迅为我打开了一条通向中国人内心的道路”^⑩,普实克与鲁迅的缘分从此缔结。在普实克看来,鲁迅的作品“可与杜甫的诗相媲美”,“我是通过自己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和短篇故事的论文,才得以和鲁迅先生接近的,他写了第一部中国小说史以及其他一些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论文。我就这些问题和他在书信里进行探讨,他对我提出

①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序第7页。

②赵一凡等:《西方文论关键词》(第一卷),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年,第686页。

③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序第15页。

④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版初版序言,张德强译,《近代文学研究》(公号)第112期。

⑤季进:《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与批评,永远是我的首要工作——夏志清先生访谈》。

⑥刘绍铭:《夏志清传奇》,夏志清:《谈文艺 忆师友:夏志清自选集》,台北:INK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321页。

⑦普实克:《回首当年忆鲁迅》,《解放日报》1956年11月17日。

⑧普实克:《中国——我的姐妹》,丛林等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

⑨陈漱渝:《普实克和他的东方传奇》,《上海鲁迅研究》2010年第1期。

⑩普实克:《回首当年忆鲁迅》。

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建议”。^①1936年6月,普实克在日本给鲁迅写了一封信,他准备将《呐喊》翻译成捷克文,希望鲁迅为译作做序且提供照片,并希望鲁迅谈谈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鲁迅抱病为这个不相识的捷克青年写了《〈呐喊〉捷克译文序言》,附了照片,授权翻译并表示不要稿费。普实克收到信异常激动,并给鲁迅回信致谢。1937年12月,由普实克、诺沃特娜选译的《呐喊》(收入鲁迅的8篇小说,附有鲁迅的亲笔短序)由布拉格人民文化出版社出版。该书是鲁迅作品的第一个捷文译本,后记亦是第一篇向捷克读者介绍鲁迅其人其文的文章。自此之后的10年中,普实克发表、出版了很多鲁迅的相关文字^②。其中,这些关于鲁迅的论述有不少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学术影响。比如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引言》一文中,普实克针对波文1946年在北平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资料谬误,以及对鲁迅的误读进行了纠偏,有利于鲁迅在西方读者中的传播^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962)引起的“普夏之争”几乎成为海外汉学的一桩公案(下文专论)。再如《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1967)一文,普实克认为这篇小说的特点在于“不以情节为阶石而直达主题的中心”,并将这种削弱情节,甚至完全取消情节,对个人回忆方面的强调的倾向看成是抒情作品对叙事作品的渗透,由此得出“鲁迅作品中明显的怀旧和抒情特征使他不属于19世纪现实主义传统”,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的出现是一种“突变”。^④尽管对《怀旧》的解读,普实克与王瑶、王富仁等人观点有别,但不可忽视普实克在这篇解读中的一些新见:比如把鲁迅放在与中国文学传统以及欧洲文学传统中进行考察的“世界视野”;比如第一次用“抒情性”这一概念解读这篇非情节化的小说——正如王德威所说,普实克是西方汉学家中第一个“将抒情与史诗并置起来讨论中国现代文学”^⑤。可以说,王德威后来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的“抒情传统”,并以此作为重新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符码,可能正是受惠于普实克的学术启迪。1952年10月,在普实克的热切主张和推动下,布拉格的鲁迅图书馆得以成立,这既是中捷两国文化互信和交流的见证,也是普实克与鲁迅跨国情谊的历史延续。

从学缘谱系和知识背景的角度追踪普实克的学术渊源很有必要。普实克学术背景丰富,曾求学于布拉格、德国、瑞典,又在日本、中国留过学,师从过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哈龙和黑尼施等学者,其专业从最初的社会历史学转向中国中古和中国近现代文学。1945年普实克创立了东方语言学和远东历史学教研室,并创办《新东方双月刊》。1953—1968年普实克担任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所长,1955年当选为科学院院士。^⑥不得不说的是,20世纪50年代在捷克布拉格,一批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学者(包括普实克的学生或其他同僚),以普实克为中心,形成了学术史上著名的“布拉格汉学派”——此学派区别于20世纪30年代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特色的布拉格学派(又称功能语言学派)。对于普实克和布拉格学派,在学术方法上,“普实克的批评方法一方面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美学的熏陶,另一方面受到了形式主义(如什克洛夫斯基、提纳诺夫)、结构主义(穆克洛夫斯基、雅各布逊)的影响,并在这两个方面尽可能达成一种辩证的张力”。^⑦在评价中国现代文学时,普实克更注重现代作家作品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之间的复杂关联,重视文学的历史作用,同时也会兼顾到新文学作品中的传统因素遗存。夏志清与普实克的学缘差异,总结起来便是:“前者是一位中国留洋学生,受训于美国‘新批评’大本营的耶鲁大学英文系,以欧西文学为基准回顾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其思想倾向主要是英美的自由主义,对共产主义及其政权非常抗拒。后者的基本训练是欧陆的学理

①普实克:《中国——我的姐妹》,第370页。

②张杰:《鲁迅:域外的接近与接受》,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300—303页。

③陈漱渝:《普实克和他的东方传奇》。

④普实克:《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李燕乔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16页、119页。

⑤季进:《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6页。

⑥刘燕:《从普实克到高利克:布拉格汉学派的鲁迅研究》,《鲁迅研究月刊》2017年第4期。

⑦刘燕:《从普实克到高利克:布拉格汉学派的鲁迅研究》。

传统,对中国文化始于好奇想象,再转化成同情投合;这当然又与其政治思想由民族解放出发,再求寄托于社会主义的理想有关。”^①不同的知识背景、文化传统决定或影响了普夏两人的学术视点和研究方法。因而,面对鲁迅这一研究对象,两人也呈现了迥异的学术理路。

二、“普夏之争”中的两种鲁迅研究理路

1960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被西方学者认为是“拓荒巨著”^②,同时也得到了尖锐的批评。典型的有,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普实克在1961年欧洲顶级刊物《通报》(T'oung Pao)上发表题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评夏志清的〈中国小说史〉》,指责夏志清是“有严重政治偏见的主观批评家”。夏志清随后撰写相近篇幅的长文《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逐一反驳普实克的观点。普实克长夏志清15岁,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就已翻译出版了捷克文《呐喊》《子夜》《论语》《中国话本小说集》等作品,奠定了学术地位,论争之时,普实克已是声名远扬的国际汉学家,而夏志清则刚刚崭露头角。这场争论中,双方都情绪激昂地指责对方的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存在缺陷,双方的文学史观也通过这场硝烟弥漫的论争得到了彰显。这场论战被称为“普夏之争”“普夏笔战”。如今回顾这场文坛学案,普实克及其学生之所以发起对夏志清论著的尖刻批评,在于不满夏过于“主观”的学术方法,而夏志清的奋起回击更多有维护声誉的意味^③。

在具体论争中,普实克的文章分为“概论”“方法的对比”“作家群像”三部分,其中在第二部分,“普实克将47页书评中的整整20页奉献给了鲁迅”^④,主要以鲁迅为例谈论夏志清的批评方法;夏志清的回击文章也包含三个部分,“基本问题”“鲁迅”“其他作家”。可见,两人的论争针对性很强,覆盖了方法论、鲁迅和其他作家三个方面。

从基本文学史观和批评方法上看,普夏两人的差别是显见的。夏志清坚持艺术自律原则,反对文学承载过多的社会功能,治文学史时多以新批评的方式分析作家作品。在他看来,好的文学除了艺术技巧层面,更应有超脱社会表层和现实内容的对心理真实、个体生活的表现,甚至体现宗教信仰和欧美“大传统”的文学。他所执持的批评标准,“全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原则”^⑤。在对鲁迅的看法上,夏志清秉持着这样的观点——“我对鲁迅亲共,捧苏联文艺一向有意见”。^⑥而普实克则非常看重文学的社会、历史层面的功能,如果说夏志清看重的是文学的文本价值,那么普实克更注重在社会、文化、历史视野里考察文学的功能。当夏志清在文学史中高举“伟大传统”和劳伦斯“勿为人类但为圣灵写作”标杆,轻视济慈所说的带有“明显的图式”而偏爱“无个人目的的道德探索”等文学观念,贬低鲁迅责难现代作家的平庸时,普实克则认为批评家不应该简单指责现代作家,而应认真反思现代作家选择这种文学道路的必要性,努力揭示决定现代文学的历史背景。继而,普实克进一步指出,夏志清的根本问题在于,“他未能把他在研究的文学现象正确地同当时的历史客观联系,未能将这些现象同在其之前发生的事件相联系或最终同世界相联系。他没有采用一种真正科学的文学方法,而是满足于运用

①陈国球:《“文学批评”与“文学科学”——夏志清与普实克的“文学史”辩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②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序第10页。

③一直到晚年,夏志清都将这场论争视为捍卫自己的荣誉之战。他说,面对普实克在欧洲知名学报《通报》上撰文把这本书批得“体无完肤”,“我迫得奋起作辩,不然我在批评界、学术界的声誉恐怕就要毁于一旦了。”参见夏志清:《夏志清论中国文学》,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序言第3页。

④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33页。

⑤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27页。

⑥刘再复:《夏志清先生纪事》,《新文学史料》2014年第3期。

文学批评的做法,而且是一种极为主观的做法”。^①

文学史观和批评方法上的这种差异鲜明地体现在他们对鲁迅的研究实践和论争中。首先,在对鲁迅文学成绩的总体评价上,两人争执不下。夏志清在小说史中重点分析了从《狂人日记》到《离婚》的九部作品,认为这些作品是新文学初期的“最佳作品”,这些“主要描写一个过渡时代的农村或小镇的生活”的作品,“有足够的感人力量和色彩去吸引后世读者的兴趣”。但除此,夏志清认为《孤独者》《伤逝》《幸福的家庭》充满了伤感的说教,而且取材仅仅局限于“故乡经验”是他的一个“真正的缺点”;同时,《故事新编》的浅薄与凌乱,显示出一个杰出的小说家“可悲的没落”;晚年杂文的创作体现了“创作力的消失”,在此基础上,夏志清得出结论:鲁迅的“自以为是”和“他自己造成的温情主义使他不够资格跻身于世界名讽刺家之列”^②。普实克在批驳文章中,一方面在具体作品的分析上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比如对于夏志清所认为的《故乡》中闰土的格外不幸来源于“家室之累”,普实克则认为沉重的捐税、兵乱、孩子、官府和高利贷者合力造成了闰土的不幸^③。再如,普实克不同意夏志清用象征主义的方式解读《药》。另一方面,普实克试图指出夏志清在脱离历史语境和资料缺乏情况下对鲁迅做出的诸多论断都是错误的,在方法上是一种主观主义的批评方式。普实克认为鲁迅对旧制度和黑暗现实不屈不挠的抗争这一“统一的目标”影响着鲁迅的整个创作。

在对1926年以后鲁迅文学的评价,以及鲁迅创作是否衰竭问题上,普夏两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争。在此问题上的看法上,夏志清与其兄长夏济安如出一辙。夏济安认为1926年创作完《彷徨》和散文诗集《野草》之后,标志着鲁迅“创作生命的结束”^④。夏志清看法与此类似,他认为,1926年从北京南下后,鲁迅在厦门和广州两地的生活的无定和不愉快,以及他与其他左翼作家激烈的论争,使得鲁迅不能够专心写小说,1929年在信仰共产主义后,成为众人拥戴的文坛领袖。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这种经历与转变下,“他很难再保持他写最佳小说所必须的那种诚实态度而不暴露自己新政治立场的浅薄。为了政治意识的一贯,鲁迅只好让自己的感情枯竭”。^⑤因而,鲁迅后期的杂文写作成了鲁迅艺术枯竭后的避难所,“在他投共以后,杂文的写作更成了他专心一意的工作,以此来代替他创作力的衰竭”。^⑥对于1920年代后半期以后的散文,夏志清肯定它们“有生动不俗的意象或例证”“绝妙的语句”“冷酷狠毒的幽默”等艺术特性,“但整个来说,这些文章使人有小题大做的感觉。鲁迅的狂傲使他根本无法承认错误。文中比较重要的对社会和文化的评论,又和他的诡辩分不开。他可以不顾逻辑和事实,而无情地打击他的敌人,证明自己永远是对的”。^⑦普实克并不赞同鲁迅后期创作力衰退的论调,关于鲁迅离开北京后停止小说创作的原因,他认为段祺瑞政府的“三一八惨案”对学生的屠杀迫使鲁迅离开北京,而蒋介石的1927年的血腥“捕赤”又迫使他离开广州,“一定是这两个事件使鲁迅认识到了全力投入同反动派斗争的必要性,而且从那以后,他便成为一位不妥协的战士。很明显,这种斗争和为赚得微薄稿酬来维持家庭使他没有时间平静地从事创作。然而他这一时期的杂文被证明具有特殊的思想深度”。^⑧

如今,距离夏志清立论的年代已过去五十余年,鲁迅研究已逐渐褪去了意识形态绑架,“鲁学”也成为了现代中国最具魅力而言说不尽的论题之一。夏志清关于鲁迅的种种论断,其武断、意气,以及

①普实克:《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第220页。

②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4—40页。

③普实克:《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第240页。

④夏济安:《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万芷均等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8页。

⑤引自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0页。这段文字在1979年台湾友联出版社和2001年版香港大学中文出版社的同名书中都存在,在2005年的复旦大学版中删除了。之所以删除类似贬鲁言论,译者和出版方是为了淡化该书初版本中过强的政治偏见。

⑥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44页。

⑦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42页。

⑧普实克:《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第241页。

由此形成的学术见解上的偏狭甚或错误,无需做太多学理上的辨析便可昭然。鲁迅杂文的价值,鲁迅后期创作力等问题,在学界几乎已形成了一些共识性的看法。比如,关于鲁迅的杂文,鲁迅的“宿敌”梁实秋曾说过,“鲁迅的作品,比较精彩的是他的杂感”。^①其实,鲁迅的挚交瞿秋白早在1933年在《鲁迅杂感选集》长篇序言里,就已对鲁迅杂文的价值做了令人信服的系统阐述。瞿秋白把鲁迅杂文放在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以及鲁迅由进化论到阶级论,由个性主义到集体主义的思想转变历程背景下加以考察,他认为鲁迅的杂感是一种“社会论文”,并将这种文体称为“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②——所谓阜利通,原指欧洲报刊上的短篇小品文。至于鲁迅为何钟情于这种文体,以及鲁迅赋予了这种文体怎样的特质,瞿秋白这样写道:“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溶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③瞿秋白这篇长文,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系统谈论鲁迅杂文的专论,可以说是带着“了解之同情”的历史眼光,切近历史真实语境,符合鲁迅晚年的文化心理和真实处境,对鲁迅杂文的历史成就所做的断语确切可信。简言之,鲁迅之所以在晚年放弃小说的写作而转向杂文写作,其原因并非夏志清所言创造力的衰退,鲁迅选择了这种“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应社会上的日常事变”文体,在于其急切批判社会积弊、急速坦陈忧愤心情的文化心理所致。

面对普实克的这些批评,夏志清在翌年的《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一文中部分地赞同对方的观点并纠正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但更多的是重申自己的批评立场或反驳普实克的观点。比如,对于普实克批评他对个别作品评价错误,夏志清承认自己对《狂人日记》的评价过低,经过进一步的阅读和思考,他得出新的结论:“《狂人日记》是鲁迅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其中的讽刺和艺术技巧,是和作者对主题的精心阐明紧密结合的,大半是运用意象派和象征派的手法。而我要求作者‘把狂人的幻想放在一个真实故事的构架中’并‘把他的观点戏剧化’是错误的。”^④同时指出,普实克由于过分倚重作者意图,对鲁迅小说的“意图与目标”所抱的“事先假定”^⑤,使他做出了带有偏见的解读。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20世纪80年代甫一在大陆面世,其贬鲁迅和左翼而扬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的文学史格局给大陆学界带来不小的震惊,也引起了很多的非议。与夏志清颇有交情的刘再复,当年初读到小说史时,对于夏志清在张爱玲和鲁迅之间表现出来的“过于偏激的褒此贬彼”和“以嘲讽的基调描述鲁迅”的价值立场,难以接受,持“保留”态度。^⑥夏志清对鲁迅的贬抑,对于大陆学术的影响是明显的,一方面他不袭文学史极度推崇鲁迅的传统,把鲁迅从现代文学之父和文学最高峰的神龛里移放到功过同样明显的杰出小说家行列,这成为后世倒鲁、骂鲁、反鲁派常常征引的理论资源;另一方面,夏志清把鲁迅边缘化、打入文学史另册的学术实践,其所包含的政治偏见、去历史化的研究方法和诸多“独排众议”的结论,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成为后世不断反思的学术论题。

三、政治偏见、作者意图、历史化与文学史观的纠缠

普实克和夏志清的现代文学研究和鲁迅研究分别起步于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作为

①梁实秋:《关于鲁迅》,台北:爱眉文艺出版社,1970年,第6页。

②何凝:《〈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鲁迅:《鲁迅杂感选集》,上海:青光书局,1933年,序言第2页。

③何凝:《〈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鲁迅:《鲁迅杂感选集》,第2页。

④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36页。

⑤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46页。

⑥刘再复:《夏志清先生纪事》。

海外汉学的两个旗帜性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文学史观念、学术方法和具体学术见解均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和文学解冻时期,更是以势不可挡的态度冲击了大陆学者的治史理念,成为引发20世纪80年代后期“重写文学史”思潮的重要因素。程光炜曾撰文说到,夏志清推崇文学本身的美学和修辞,“他事实上是在为80年代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建立一套关于经典作家和作品的行业标准,以及一丝不苟的审美过滤机制”,而夏的研究所依据的新批评的“知识原点”,显然区别于此前以社会学为知识原点的理论传统,这也就意味着它要把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重新纳入到世界性的知识视野和理论范畴之中”^①。这种关注文学本体价值的“过滤机制”和“世界视野”正是夏志清留给后人的重要遗产。可以说,夏志清和普实克的鲁迅研究代表了海外汉学的两种基本路数,包含了诸多值得细致探析的重要话题。除了上文所提到的理论渊源、批评方法、普夏之争等话题,他们的鲁迅研究所涉及的政治偏见、作者意图、历史化问题,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中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重要议题,值得稍作辨析。

第一,政治偏见与文学史写作。

夏志清所置身的冷战背景及其西方知识体系,使他难脱审视鲁迅或现代文学上的西方视角和政治偏见。他对鲁迅和其他左翼作家怀有恶毒的“敌意”^②招致了普实克的极其不满。对于自己的治史立场,夏志清有着自觉的体认,他在晚年曾说过,早年他的中国现代文学阅读并不多,拿到英文系博士后,才开始真正阅读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早年阅读记忆的空白使他减少了对这些作家的“感情负担”^③,同时他也不避讳自己的政治立场。在夏志清看来,鲁迅是官方捏造出来的一个神话,“鲁迅神话”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可以用来加强国民党贪污和腐败的印象”,“今天这个神话的效用已经有点过时,不过把鲁迅仍视为国家英雄,对于中共政权是有利的”。^④

客观地看,鲁迅生前和死后一直处于各种势力忌惮与拉拢的状态中,尤其是自1936年去世后,鲁迅成为一种被反复改造和利用的文化资源,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鲁迅”和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鲁迅”,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时期鲁迅”和“文革鲁迅”,鲁迅确实是逐步被刻意建构起来的“神话”。夏志清清楚地看到建构这一神话的权力话语和意识形态因素,决绝地在自己的文学史中打碎了这一神话,这种“去政治化”的书写对于还原真实鲁迅、剥离鲁迅形象与现代权力因素之间的胶着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另一方面,由于夏志清缺少对现代中国的真切了解,他没有看到或是故意忽视鲁迅作为现代中国秩序中的异类和先锋作用——正是这种对旧的社会制度和落后文化性格不屈不挠的抗争,使鲁迅成为现代中国追求现代性的颠踬旅程中的思想先锋和清醒的斗士。显然,夏志清缺少对鲁迅在现代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以及文学史上的这种重要作用的认识,在鲁迅与现代中国的关系上,“他可能不承认文学具有社会作用,但这种作用确实存在,作家应该对他的生活和创作向他所从属的社会负责”。^⑤可以说,他以淡化或简化鲁迅的理念,对鲁迅进行了“去政治化”的书写,以新批评的方法剔除鲁迅所处的丰富而复杂的历史语境,直面鲁迅的文本,最终把鲁迅从文学史的经典序列中挤出去。夏志清的鲁迅研究是一次带着政治偏见试图矮化鲁迅,最终走向矫枉过正、远离真实历史图景的批评实践。依据冷战思维和西方“伟大传统”进行的疏离、重新编织既定文学史格局的写作,使其进入了用一种政治标准反抗另一种政治标准、以一套权力话语反对另一套权力话语的方法论简单循环之中。

有一个近乎是悖论的问题值得我们追问。我们知道,夏志清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体现了“感时

①程光炜:《〈中国现代小说史〉与80年代的“现代文学”》,《南方文坛》2009年第3期。

②普实克:《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第213页。

③刘再复:《夏志清先生纪事》。

④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⑤普实克:《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第215页。

忧国”的灼灼情怀。这种感时忧国与夏本人的历史记忆有关,“夏志清生于1921年,在他1947年赴美之前,整个青年时代可说都是在‘五四文化潮流’和‘抗战爱国激情’的感染下度过的”。^①对于现代中国社会尤其是对动荡和战乱时局的这种亲身体验,应该有助于夏志清分析现代文学和现代中国之间的关系,鲁迅和左翼作家在社会进程中对底层的关注,对社会弊病的抨击,不正是一种“感时忧国”的最好体现吗?究其因,根本问题还是在于其对大陆官方权力和鲁迅的政治偏见,这种偏见限制了他对鲁迅现实主义精神的深度理解,新批评的路数又使他抽去了鲁迅置身的历史与文化语境,当仅仅在文本层面解读鲁迅小说时,简化、误读便可避免了。

对于自己的偏见,早在“普夏论争”时,夏志清已经自觉反思,并对其进行了部分修正。在夏志清的晚年,他对左翼文学和鲁迅的评价发生了一些变化,甚至是一种自我纠偏。刘再复在回忆文章中提到,夏志清曾将《文艺报》上评价他的文章寄送给刘的细节,《文艺报》的这篇文章直言夏志清对鲁迅、丁玲怀有的偏颇,同时坦言,夏本人消解了“思想的偏见”。看得出,夏志清并不忌讳这篇文章对他反鲁倾向的批评,同时他非常认可该文作者指出夏志清自我纠偏这一晚年心态上的极大变化,甚至有几分惊喜。刘再复通过夏志清寄送剪报这一“很不寻常”的举动总结到,“晚年的夏先生很了不起,他放下了‘左右两极,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了,放下曾有的‘偏颇’了。他把‘政治’搁置一边,用更纯粹的文学眼光评价作家,显然认可‘校正和消解了思想偏见’这样的评说”。^②大胆启用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并不惮以政治偏见进行文学史研究,充分体现了早年夏志清作为治史者的独立果敢和范式上的开风气之先。同时,晚年夏志清对自我政治立场上的有限调适也体现了融通、平和的史家胸襟。

某种意义上,文学史既是一种还原文学史实的历史再现,更是一种充满主观性和历史性的建构性叙事。在一部文学史中,没有谁能打捞所有的文学活动与历史细节,也不能保证每一断语和评价都能客观公正。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夏志清凭一己之力,基于个体的知识结构和评价系统,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个体意义上的历史评价,尽管他的学术实践难逃大时代意识形态的渗透与个人对鲁迅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但这丝毫不能掩盖他的诸多论断具有的拓荒意义。尤其是,不袭旧说,不畏权威,敢于独立评判文学现象,自立新说,更是当下学人应该记取的学术精神,这也是夏志清留给后人最大的学术遗产。夏志清一直对自己敢于形成“judgement”充满自豪,即使与博学的钱锺书相比,他也自信如此,“他对诗艺的研究、比较诗学的研究,是没话讲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说,他没我胆子大,我是综批中国文学”。^③绝对公正而客观的文学史是不存在的,这种“片面的深刻”的文学史,比起当下那些四平八稳、毫无创新的各式文学史有价值多了,至少前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或是在局部文学阐释上提供了新见。在对待鲁迅评价问题上,夏志清的贬抑鲁迅和左翼作家,在观念上破除了神化鲁迅的路数,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贬鲁思潮开了头。把鲁迅从意识形态的捆绑和高高在上的神龛里“解放”出来,让日常鲁迅、真实鲁迅回归大众视野,让鲁迅研究回归学术轨道,这是鲁迅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重大学术转向。客观地说,夏志清的鲁迅书写和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方式,尽管带有“黑鲁”的偏见和意识形态层面的操控,但对于官方、学界过于单一的鲁迅言说不啻是一种巨大冲击,唤醒了治史者的理论自觉,为鲁迅研究的新局面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支持。

第二,文学研究中的作者意图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普夏两人的研究尤其是论战中,频频论及到“创作意图”“写作目的”这些关键词。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要不要考虑作家的“创作意图”,答案是肯定的。但在如何定位“创作意图”

^①张毓纯:《当代中国文学思想的政治脉络:夏志清、李欧梵与王德威之间的传承与变迁》,台北:台湾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2011年,第10页。

^②刘再复:《夏志清先生纪事》。

^③季进:《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与批评,永远是我的首要工作——夏志清先生访谈》。

的作用——即如何处理治史者的独立评价与作家的创作意图两种评价标准,以及如何认识创作意图与艺术效果之间的差异或悖论方面,两人具有较大分歧,并展开相互之间的责难。

普实克特别关注“作者意图”,认为忠实于作者原意,这是解读作品主题,对文本进行历史性解读的重要维度,如果不尊重作者意图,显然是一种“主观的观察”,缺少客观性和科学性。然而,夏志清则认为“衡量一种文学,并不根据它的意图,而是在于它的实际表现,它的思想、智慧、感性和风格”。^①两人在这一问题上的论争,恰恰反映了传统社会历史批评、实证主义批评与新批评之间的重大分野,即传统社会历史批评对作者意图上的倚重和新批评对作者意图的轻视。传统社会历史分析,基于世界、作者、文本、读者是一个有机、相互作用的整体这一认识,认为文学文本,尤其是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文学,真实再现了作者的思想与情感,他们相信作家的自述、访谈、日记、传记等写实性文字的真实性,而且与文学文本之间可以构成一种相互印证的关系。因而,作家自己的声音和所谓意图,常常可以用来佐证或反驳文本的意义建构。新批评的“意图谬见(intentional fallacy)”强调,“一首诗的意义在它的内部,是由其话语层面的语法、词义和句法等决定的,不决定于诗人在谈话、书信或日记里吐露的意向;作品的意义与作家的意图不相干,不能把作家在别的场合表现的意图强加到作品”。^②上文提到,普实克批评夏志清的“主观描述”完全掩盖了鲁迅创作的意图和目标,而夏志清则指责普实克在解读鲁迅时过分依赖所谓“作者意图”,甚至对这些意图抱有“事先假定”,从而形成了带有“偏见的解读”,二人通过“作者意图”这一中间环节相互指责对方是主观阐释,而自己才是科学分析。两人在“作者意图”上的分歧在于:第一,靠作者意图阐释文本,还是靠文本自身逻辑;第二,作者的真实意图是什么。细细辨析可见,夏志清和普实克两人都不否认“作者意图”的有效性,只是前者在文本阐释中并不看重立论和作者意图之间的相互印证关系,而后者则非常看重作者意图对于文学阐释的参照意义,甚至将之直接视为文本的意义终点。这点正如夏志清所说,“尽管普实克重组了一些‘科学的’事实以说明鲁迅的勇敢的乐观主义,但事实证明,我对《故乡》及《呐喊》中其他小说的分析更符合鲁迅本人在《自序》中对自己的‘意图’所做的评价。而且我并不是依靠那些‘意图’陈述,而是完完全全通过分析小说本身得出这些结论的”。^③当然,两人通过对“作者意图”的激辩,最终想要维护的是自己观点的合理性以及研究方法上的科学性。

“作者意图”这一问题,还值得我们在方法论意义上进行深思。比如,在“文本阐释—作者意图—科学分析”这一链条上,是否存在一种自然的逻辑关系,即一种文本阐释活动,如果体现了、印证了作者意图,这是否是一种更科学的文学批评?反之,如果一种文本阐释,不符合作者意图,甚至与之大相径庭,由此进行的文学批评是否因为这种主观而丧失了科学性和合理性?作者意图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中,能否作为批评者立论和判断的基础性坐标?“作者意图说”和“意图谬误说”各自的理论依据和功能短板是什么,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如何甄别、合理利用作者意图?

第三,鲁迅研究的“历史化”。

夏志清和普实克的现代文学史研究所引出的另一个话题是,文学史是该“崇作品”,还是“尊历史”?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文学作品和文学历史是两个并不矛盾的范畴,都不可忽视。但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科发展历程来看,由于晚清以来中国特定的历史动荡和内外交困时局,文学的发展是在与近代以来的政治、历史和文化的复杂啮合中进行的,文学承载着太多非文学的社会现实与历史政治内涵——这也正是20世纪中国文学被一些学者称作“非文学的世纪”的原因。而中国现代文学史,从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以来,一直与政治文化、现实功效、意识形态纠缠在一起,文学史的历史分期和文学理

①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24页。

②赵一凡等:《西方文论关键词》(第一卷),第683页。

③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39页。

念无不是社会史、政治史的照搬或沿袭。一直到引入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时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新文学史写作中的意识形态倾向、政治话语依然很明显。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以前文学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得到了充分的重视,而文学本体的价值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在“重写文学史”的浪潮中,一些学者呼吁“把文学还给文学史”^①。夏志清的文学史带来的是文学史观的变化,他重视作家作品,以作品价值的高低优劣作为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在作品与历史这两极,夏志清显然更注重前者。对这一选择,其兄夏济安在1960年7月3日致夏志清的信中曾这样鼓励到:“你这本书主要的是作品的批评,关于史料方面,现在搜集的这点已够。再多搜集,恐怕反而要把书的重点淹没。”^②

也就是说,从文学研究路数来看,尽管也注重文学史料的挖掘,但夏志清研究现代文学史更多启用的还是新批评和比较文学的方法。问题是,对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如果单以作家作品作为对象,固然可以借助于新批评的方法和西方文学经典的坐标,进行文学品鉴和价值估衡,但这种脱离了文本的历史语境的文学研究毫无疑问是充满危险的,上文提到的夏志清低估鲁迅杂文的做法就是明证。新批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以及其他理论话语,在解读文学文本固然能够看到文本的一些特质,得出一些新颖的结论,但这些西方理论如果脱离了具体区域地理、历史语境和文化传统,无异于一种理论预设与话语强行征用,会造成方法论上的强制阐释,其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可信,甚至是极其有害的。

近些年,在鲁迅研究和当代文学研究中,研究的“历史化”问题不断被提起。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方法论热”始,新的观念和研究方法如潮水般涌入国内,开始洗涤人们的头脑。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主义”和“理论”以更加迅猛之势进入当代文学研究,理论资源的丰富确实带来了文学阐释的丰富性,但另一方面,理论话语与文本内容的脱节、去历史化等倾向,也造成了文学研究上的过度阐释或强制阐释。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学者呼吁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问题^③。在鲁迅研究中,一直存在着“批评化”和“非历史化”的倾向,“不光是当代文学史研究,即使在现代文学史研究中,这种以‘批评’的结果或主导‘文学史’研究结论的现象,也非常明显地存在着。举例来说,就是引人注目的‘鲁迅研究’。那些被‘批评化’了的‘鲁迅形象’,不仅成为许多鲁迅研究者的‘研究结论’,而且也显而易见地成为关于鲁迅研究的文学史成果”。^④可以说,无论是对于当代文学整个学科,还是对于鲁迅研究这样的专题,“历史化”的学术理念已成为很多学者的共识,“历史化”地研究鲁迅也一直是颇具生命力的研究方法。普夏两人的鲁迅研究再次提醒我们重视对历史化这一问题的探讨,也使我们想起詹姆斯那句“永远历史化”(always historicize)的谆谆告诫。

结 语

总体来看,普实克和夏志清是海外汉学家中的佼佼者,作为海外汉学第一代研究者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式,在欧美传播了中国现代文学。他们治学严谨,对中国文学(古典文学和近现代文学)倾心倾力,形成了诸多卓越而独到的研究观点。尤其是激烈交锋的“普夏之争”,更是集中而鲜明地呈现了两人不同的文学史观,并由此引出了诸多值得探究的话题。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历史批评和新批评一直到现在都是解读作家作品最基本的方法。当然,当我们将这一学案进行历史回顾时,我们更

①语出学者李杨。

②王洞、季进编注:《夏志清夏济安通信选刊》,《新文学史料》2018年第1期。

③比如程光炜先生,近些年一直在呼吁并实践着当代文学的“历史化”研究。针对当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简单套用、过度依赖理论,以及仅仅停留在文学批评层面的倾向,程光炜提出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在具体操作策略上,提出文学“周边研究”的路径。在程光炜看来,对研究对象的历史化,是为了发现“历史遗址”原本具有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多样性。可参见程光炜:《文学、历史和方法》,《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3期;《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文艺研究》2008年第4期等文章。

④程光炜:《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文艺研究》2008年第4期。

应该看到这些史观和方法的局限,尤其是生成、影响普夏两人学术理路的历史语境和知识传统。客观地看,普实克的鲁迅研究试图在较为丰富的原初语境下还原、阐释鲁迅,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社会历史分析的思路,在研究方法和结论上更为可靠;而夏志清由于强烈的偏见,对鲁迅进行“减法式”研究,切割鲁迅与现代中国的复杂关联,忽略鲁迅文学所包含的巨大历史、文化内涵,把鲁迅的小说当作孤立文本放在新批评棱镜下进行封闭的内部解读,同时否认鲁迅《呐喊》和《彷徨》之外的其他文本的历史价值。可以说,由于政治偏见、西方视角和减法式研究,夏志清的鲁迅研究充满了武断和意气,限制了他在这—领域提出更多“史识”。尽管刘绍铭、王德威等夏志清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在不同场合为夏志清进行种种“辩护”,但一直以来对夏志清的“挞伐”并未停止,有学者甚至认为,由于强烈的意识形态操控,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鲁迅专章“几乎很少有立论能够站得住脚”^①。因而,可以把夏志清的鲁迅研究视为是一种症候,或是一个巨大语义场,在这样的症候和语义场里,汇聚了中西学术传统、不同文学批评标准、意识形态偏见、贬鲁和扬鲁等多重话语体系,而我们所要做的正是要对这些“话语”进行清理与反思,对这种“偏见”进行理解与“纠偏”,这也是我们对海外鲁迅研究和海外汉学遗产应该具有的基本学术立场。

(责任编辑:蒋永华)

C. T. Hsia and Jaroslav Prusek's Studies on Lu Xun: A Methodological Review

SHEN Xingpei

Abstract: C. T. Hsia and Jaroslav Prusek formed quite different academic ideas and research paradigms in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Prusek sympathized with Chinese revolution, and affirmed the realistic character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by means of social-historical analysis. He thought highly of Lu Xun's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Influenced by the New Criticism, Hsia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ident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value of Lu Xun's works. Also influenced by the cold war background and historical prejudice, he practiced the pursuit of de-historicization, and thus dwarfed Lu Xun's accomplishments to some extent. The academic divergence between the two scholars was more distinct after “the Academic Disputes Between C. T. Hsia and Jaroslav Prusek” taking place between 1961 and 1963.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in which Hsia and Prusek began and conducted their Lu Xun studies, this paper traces the theoretical resources of their academic practice, identif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r limitations of their respective views on Lu Xun and his works embodied in the “the Academic Disputes Between C. T. Hsia and Jaroslav Prusek”. Finally, this paper reflects on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ry history writing and political prejudice, authorial intention, and historicization through comparing Hsia and Prusek's studies on Lu Xun.

Key words: C.T. Hsia; Jaroslav Prusek; Lu Xun studies; social history; New Criticism; authorial intention

About the authors: SHEN Xingpei, PhD in Literature,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①高旭东:《评夏志清贬损鲁迅的意识形态操控》,《中国文学批评》2016年第2期。